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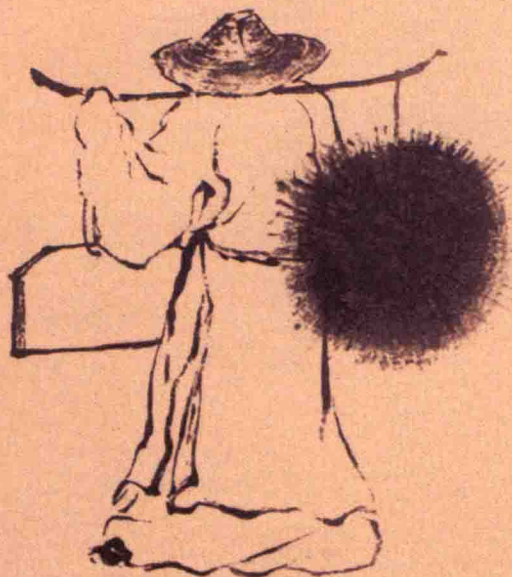
王汎森 著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修订版)

斗笠笠生不知何許人也
魚聲版介肺天涯聲叫道
我不化你喜經造像我不化你
利物爾僧也不化你心疼的銀
錢地三六化你本有的良知良
德一念中有些差池土更頭還
該醒三休認做零碎楓園歸帳
時終須結繩



丙申年並書

王汎森
著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

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修订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67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王汎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9

(博雅撷英)

ISBN 978-7-301-26148-4

I. ①权… II. ①王…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B24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8012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原著作名《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书 名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
著作责任者	王汎森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陈 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148-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9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博雅擷英

修订说明

趁着本书再版的机会,我请助理将全书再次校读一遍,并核对全部引文及研究资料,同时也增添了若干新的研究信息,对少数内容做了修订。本来曾考虑加入新发表的文章,最后也打消了念头。所以,全书基本上仍然维持原貌,作为自己过往学术工作的记录。因为我对本书主题“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的相关问题仍然持续关注,并陆续撰写新的文章,希望未来能够出版本书的“续编”,对这个问题做更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序 论

这一本书的编选经历过两个全然不同的阶段。

大概十年前,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发动了一个计划,希望在大陆出版一套台湾学者的论著选集,每本约四十万字,当时我毫不考虑地答应下来。但是这件工作拖了十年仍未交差,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应该多收新作,而不只是把曾经集结出版的文章再集结一次。

然而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选集。最初的设想是要收入我从明清到近代思想学术方面的文章。我以这样的面貌规划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连导论《史家的逻辑与事件的逻辑》也都写好了。最近当我决定应该为这件工作做一个了断时,一种完全不同的编辑概念浮现在我脑海中,亦即缩小范围,只收集与清代有关的文章。

依我个人观察,清初以降逐渐形成四股力量的齐旋,一股是晚明以来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生活逻辑、城市化、商业化、逸乐、流动,以及日渐复杂化的生活形态;一股是道德正统主义的力量,这股思想是认为即使当时的现实并非如此,但理想上应该朝道德正统主义迈进;一股是经典考证回向古代的势力;一股是因为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四股力量往往交织在一起,像“风”一样吹掠而过,形成无处不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像毛细管作用般,在最微细的、最日常的、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力量。而这本书中有多篇文章都与前两股力量有关。几经思考,我决定用书中篇幅最长,且从未发表过的《权力的

毛细管作用》为书名,并加上一个副标题^[1]。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为题,并不表示它涵盖了本书每一篇文章的意旨,这是首先要声明的。



我之所以迟迟未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完成,原因很多。我在写成这篇文稿之后,发现前前后后有若干问题是应该同时解决的。预想中的题目包括《晚明遗献的复活》等文,但是我始终没有时间好好将这些长文写成。

本书中与“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相关的几篇文章,我稍后再说。此处先介绍这本选集最开头的几篇文章,它们分别讨论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经典考证及回向古代之势、道德意识之转化、政治思想的转换,以及“礼治理想”之兴起。这五个方面正好是明清思想转型的几个主轴。我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中还有若干篇文章与“转型”有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第一篇文章是《清初思想中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该文以“去形上化”为主轴来讨论清初学术思想的一个特色,因为有这一个特色,所以清初思想家看社会与自然的眼光皆产生了变化。该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借“宝珠”或“种子”两种观念来说明先天预成式的人性论之式微。第二部分是四书(特别是《大学》《中庸》)地位之下降说明此一现象。第三部分是以江浙心学社群之去形上化来说明这一段历史。第四部分则由朴素的原始儒家哲学的兴起来说明形上玄远思想之没落。第五部分则由清初程朱陆王两派皆显现的“去形上化”来证明

[1] 收在本书的文章只有《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与我多年前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重复,其余都未收入我的任何论著中。

这一趋势的普遍性。

《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一文，主要在谈明末到清初“礼治理想”的兴起。我认为这不纯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史的问题；不纯然是学术的运动，而是有其现实的社会背景。晚明以来四民社会秩序的动摇、士风的败坏和高度商业化后高下标准的变动，使得士人感到必须要有一套新的理想、标准来矫正，儒家的“古礼”便成为士人标举的规范。

17世纪，一群又一群的在地文人发动了一场以“礼”为主轴的清整运动，写作各种纠正风俗的小册子，希望赋予各种身份恰当的行为举止与规范，或可称之为举止的一场行为革命。“礼治”运动中，除了呼吁及阐发礼治理想之外，也有许多人深入基层，编纂及推广各种实用性的参考册子，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心性之学”在建立秩序方面已经失灵，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以新的“行为主义”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礼治社会”的理想，有光谱的浓淡之别，以回到“古礼”为最浓的一端，较淡的一端则是朱熹的《家礼》。礼教运动还有一个目的，是希望与佛、道化的礼仪，或受其污染的礼仪对抗，其中以丧礼最为显著。文章的内容在强调清初三礼学研究的兴盛，以及礼学学术社群的形成，与上述现实社会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清初的讲经会》一文则是对清初浙江甬上地区讲经会之形成、思想脉络、进行方式、会友、治学风格，以及其影响所作的研究。这篇文章论证讲经会之形成与明代后期道德价值的混乱失序、社会政治上的颓败，以及异族入侵的压力、改朝换代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反省等都有关系。该文以相当的篇幅讨论，何以在刘宗周及黄宗羲心学传统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产生了讲经团体。同时也描述了讲经会前后几个时期，以及它如何由宁波地区的一个讲经团体扩大其影响力到北京、并透过北京的讲会影响了聚集京师的官员及士人们。最后，也讨论该会与清

学兴起的关系。

此文还有另一层次的关怀，即“某种政治语言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在这个经典运动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论述与此后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运动牵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语言，使得一些原来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边缘性的、没有重要意义的语言反而成为核心，并在清初的时代氛围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此有一套不同的语言、思想、概念来想象政治、社会与日常生活。过去我们总认为那一套语言，或使用那一套语言的政治形式是自古已然的，但事实上，某种传统并非自然而然传下，“继承”传统需要努力，就好比不刻苦学习拉丁文就没办法继承古代拉丁传统一般。

关于明清之交道德意识的转化，包括了两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这两篇文章是想展示道德意识呈现的方式与转化、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而以人谱、省过会等修身册籍及团体组织为例来说明。

这两篇文章同时也说明了道德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我认为权力不只是以政治权力的方式展现，事实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强大力量，也像毛细管一样作用于个人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及《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是两个很显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一文说明，即使在最乐观的人性论下，仍可能存在着极强的道德紧张，明代的阳明学也不例外。本来，迁善改过即是阳明格物说的一个主要部分，到了明季，随着社会风俗之败坏，在部分王学信徒中，省过、改过便成为一个很热烈的论题。但阳明的“心即理”学说主张在省过、改过的过程中，人们一己之心不但要作为被控诉者，同时也扮演着反省者与控诉者，故而对根器较差的人而言，“心”同时作为一个被控诉者和控诉者，殆如狂人自医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分人转而主张：在省过改过时，应该有第三者扮演客观的监督

与控诉的角色,因而有省过会之类的组织产生。当然,省过组织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受到乡约中公开彰善纠过仪式的影响,而此一现象亦同时象征着在道德实践中“心即理”学说所面临的理论危机。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类省过会或修身日记的传统,虽有宽、严之别,却是此后士人世界一个强劲有力的传统。尤其当社会失序或国家混乱之时,人们往往祭出这个办法,强力地把自己与流俗区隔开来,有系统、有方法、有步骤地组织自己散乱而没有中心的生活,锻炼自己成为“道德化政治”的先锋队、把自己铸造成像曾国藩那样旋乾转坤的人物。而这个传统,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力量。

《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一文旨在说明四事:第一,晚明通俗宗教及善书的流行与明末清初修身日记的大量涌现;第二,修身日记反映出17世纪思想界的几种变化,包括由玄转实,由悟转修的倾向;第三,在晚明那种知识分子群体性活动风起云涌,动辄千百人的讲会逐步消歇,老师与学生当面印证的场合渐次减少之后,日记所扮演的角色、规过会的兴起,以及它们反映的道德严格主义的气氛;第四,修身日记的流通仍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与功过格等那样普及群众的善书不同。我们也可以从日记的内容中看出社会救济色彩的淡薄,以及天与袪罪等宗教色彩的开始等现象。

这两篇文章是我试着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两个领域之作〔2〕。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 1889—1943)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历史是由思想造成的,所以思想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是微血管般周流全身。试想如果不是政治思想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人类政治怎么可能从法国大革命一路演变到今天?

〔2〕 相关论点,请参见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第1期(天津),2010,页16—31。

反过来说,生活、制度或现实当然也塑造人的思想,这两者相互激荡,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我认为“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开启了一片广大的研究天地,如两者之间联系的节点,如思想的传布与扩散,如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文本、修辞,如思想通俗化的过程,如通俗文本中的思想元素,如思想与各种眼光、观点的形成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

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何以三代以下有乱无治?》,原是为一部中国经典系列丛中《明夷待访录》一书所写的导论,我之所以将它收在这里,是为了说明17世纪政治思想方面的重大变化。本文除了讨论《明夷待访录》的几个思想主轴,还特别提出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质,即它一方面严厉批判古往今来因为君权之私而导致制度、社会的败坏,并指出三代以下各种制度设计中潜藏了帝王之“私”的性格,而黄氏主张统治者应该以“公”的原则来规划合乎三代理想的制度,这个原理几乎贯穿《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所有的层面,使得它在17世纪政治思想的新发展中变得相当特别。

本文也讨论了《明夷待访录》一书在清代的流通,说明它虽然从未出现在各种禁书目录中,但很快地被政治禁制“涟漪效应”波及而销声匿迹,目前得见的少数本子中甚至有以明夷卦的卦画作为书名以逃避政治忌讳的。这也部分说明了该书为何不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样在问世之后不断扩大影响力,形成巨大的历史动能。文中并且提到它在道光之后屡次重刊的过程,正好可以与经世实学思想的崛起,以及我接着介绍“禁书复出”那一篇的内容相互关照。

二

本书的另一组文章主要是在讲“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观念来

自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福柯对权力的了解有非常大的贡献,他不像过去的人只注意权力在公开的大场面上的展现,例如制度、政策、暴力、处罚、拘捕、阅兵等。他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作用的状况。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说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每一个角落,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我借用这个观念来说明我廿年前所做的一个清代的政治与文化的研究,该文讨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的现象。

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一个主题下,原先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写作计划。但目前我只完成了三篇,即《从曾静案看 18 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这三篇是一个连环套,它们讨论清代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政策;另一方面是造成一种无边的氛围产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在“风”吹掠的当头及以后,人们秘密地调整自己、压抑自己。在《从曾静案看 18 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一文中,我已提到各地对这个案件“创造性”的反应,包括不由自主的猜测、衍绎、自我压抑等。而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我则借用包括写作、出版、藏书等等难以想象的许多案例,说明在庞大政治压力下文化活动的进行。自我压抑的现象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过度忽略了,事实上这类事例之多,远非文字所能形容。我认为我们讨论清代历史,尤其涉及思想、学术、政治等方面,如果不把这个方面考虑进去,是不可能对政治压力所形成的无处不在的潜在性剥削有比较完整的解释的。而且我也注意到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研究者,倾向于回避这个主题,或对之视而不见。我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一文,则是讨论一个人们先前不怎么注意的现象,即这些被禁毁,或是在肃杀空气之下消失无踪的书籍,如何又成群地回来。

在后面我还要结合晚清历史,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现象。本书的第四组文章主要是在讲清代中期思想学术史。

清代中期考证学如日中天,在这个时期,学术思想世界到底是“黄茅白苇,一望皆是”,或是在训诂考证之外,还有若干值得我们注意的发展?《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对〈文史通义·言公〉的一个新认识》两篇文章是我在这方面的尝试。

《程廷祚与程云庄——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个研究》一文讨论了几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第一,本文处理一个胡适所留下的难题。胡适一直想了解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思想人物——程云庄,程氏对明末清初以来的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史学界却又始终无法了解他的面目。胡适曾经将这个问题请教明清史权威——孟森,却未得到任何解答。本文利用了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孤本《程氏丛书》,试着解答胡适在七十几年前所提出的学术公案,即程廷祚(1691—1767)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程云庄(1602—1651)之间的思想关联。第二,近三百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及程云庄,但因为不曾读过他的文集,所以对他的思想内容掌握不确,本文透过《程氏丛书》厘清其思想之大概。第三,本文将程云庄与程廷祚之思想交涉作一梳理,认为在瓦解邵雍、朱子的形上体系这件工作上,程廷祚受了程云庄之启发而展现清代中期思想的一个特色——即“寻找平实、浅近的圣人”。同时也对考证学盛行时,学术界的另一种动向,即清代宋学之特质提出一个定位。第四,本文也对胡适当年建立“颜李→程廷祚→戴震”这一思想系谱时的若干成见作了检讨。

至于《对〈文史通义·言公〉的一个新认识》一文,主要是认为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对古代著述之实况提出了相当具有前瞻性的论断。章学诚一方面受当时考证学的影响,同时也孤明先发,揭露了古代著作及知识流传的实况,并对作者、著作权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譬如他说古代不认为著作是“私”的,知识是为了公共

之用。古人无忌讳抄录他人文字,倘能致用,根本不在乎原来的作者是谁。他说古代的著作是以“篇”为单位,而不是以“书”的方式流通,而许多“书”事实上是“文件集”。同时章氏的著述观念也支持了他“君师合一”“道、学、政合一”的理想;这个政治思想的提出,与清代中后期的社会情状有密切的关系。章氏揭露了古代的知识是以合乎道而施于用为贵,他认为后世为了凸显个人的见解或创获所形成的作者观及智财观念远离了古代的情状。这样的观点对乾嘉考证盛世时期“著书满家”的情况,也是一种极具针对性的批判。章氏对于古代著作观的论点,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并不受人注意,但像余嘉锡这样敏感的学者在《古书通例》中即大幅继承了章学诚的论点。章学诚、余嘉锡的这些见解,多已被近代出土的文物所证实。

本书的第五组文章,讨论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思想界的变化。大概从嘉庆后期一直到道咸年间,也就是1800—1850年之间,是晚清的一个重大变化期。我注意到许多清代思想史、学术史,往往是在写完考证学之后便接着写洋务运动及西学东渐,但是夹在两者中间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期。在西方,1800—1850年也是一个重要的段落,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准备都在这个时期。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在何种意义下为“新”,“新”的学术思想现象包括哪些成分,都是一个尚未被深入探讨的问题。《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及《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这两篇文章,是在举例说明洋务运动、西学渐入之前,帝国内部士人群体的新胎动。

《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一文,是为讨论一个我关心的历史现象,即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后成立的顾祠会作铺垫。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有一大批官员发起了祭拜顾炎武的活动,这个祠祭活动持续了七八十年。本文是以顾炎武祠的建立为引子,借《国史儒林传》成书过程,重新检讨嘉、道年间思想文化历史中,顾炎武乃清朝第一儒者的论断是如何形成的;同时也讨论了在形成顾炎武崇拜的过程中,士大夫圈如何编织了一个似有若无的“全神堂”。而官方功令、政治忌讳之逐步松弛与士人世界相应的变化,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学术、思想、社会几种力量互相交织、转变的情形。

为什么选择一种祭拜仪式作为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入口?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26—2006)认为“文化”有部分是自由一批模块或格式所组成。人们用它们来理解、诠释社会经验,人们也用它们来表演自己给自己看的仪式。维持这些模块、格式的稳面而又能表达个别之意思,是维持一个社会或文化秩序稳定的要素。人们往往透过对套语、格式的再现,及在其中所作的细微改变,来说出自己的语言,其情形一如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Natalie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中所说的,犯人大多不识字,大多是由他人代为撰写认罪书(Pardon Tale),而认罪书有一定的故事模式,所以犯人们是用一些原先即已存在的故事模式在认罪,并乞求宽恕^[3]。

在清代文化中也有一些格套、模式,对它们一再地运用与诠释,是表达士人心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存在高度政治压力的时代,如何把握人们思想情绪上可能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从人们一再诉诸的格套、模块,或故事题材中,从他们对那些看来老套的东西的衍绎,了解他们如何表达许多隐秘、奥妙的情绪与思想。

[3] 以上参考了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ch. 3, ch. 4。

祭拜白居易、黄庭坚、苏轼等题材即是这种模块或格套之一。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重述、感喟、祭拜这些历史人物，并透过这些行动曲折地表达自己的心绪。而道光二十三年之后的顾炎武崇拜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前面已大致提及，在这里，我想多费一些篇幅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作一个比较详细的交代。

我认为一部又一部禁书的复出是一个又一个的温度计。首先它们得以复出，至少反映了两面事态：一方面是反映了政治压力松弛的历程，一方面是曲折反映了清代后期一波接一波新的关心的议题（这些关心不一定会坦直地表达出来），同时也道出了若干意识形态世界的重要趋势及转折。

从清初到乾隆时代都进行过大规模的禁毁书籍的工作，而以乾隆编修《四库全书》为高峰，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已经相当多，连当时办理这件工作的相关档案也已整理出版。但是一般人似乎只注意到许许多多的文献被禁、被毁，却很少注意到有许多文献在清代后期又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上，并扮演相当吃重的角色。

在大规模禁书运动之后，大量的知识与记忆被压抑下去了，尤其是已经刻印的书，但事实上还有不少从未刊刻的稿本，一些碑铭、画像、遗址或带有纪念意味的实物也因压抑而消失，或进入不被人知的角落。故整体的结果是一种大规模的、刻意的集体遗忘，人们的知识与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了，使得二百多年中占据人们思想意识世界主要位置的是另一批知识与记忆。

官方对于书籍的信息所知仍然有限，故在官方的禁书目录之外，还有许多“有问题”的书也悄然地隐入历史的角落，我们如果披读周作人、郑振铎、黄裳等人的藏书序跋及许多藏书志，即会得到一个结论，有

许许多多的文献,因为政治空气的紧张,或者是官方的大规模禁毁,即使并未列名禁毁书目中,也自动地销声匿迹二百多年。所以这是一个“涟漪效应”,向湖心丢下一颗石头,它的涟漪会一圈一圈往外扩散,使得“敏感”不只限于官方所认定的范围,而是广大百姓心中对此“敏感性”的扩大诠释。我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已将这些林林总总的自我压抑现象作了交代。

但是禁毁及自我压抑,并未根除所有“有问题”的书,随着我们对这方面知识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几部套书的出版,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书其实都还有少量的遗留。同时,还有刻印书籍的流通管道与抄本的流通管道之分,前者可能因事涉敏感而停止流通了,但后者因为简便而且带有秘密性,仍以比较私密的方式在某些地区流传。

保留这些文献的,尤其是提供重印的保存者,最大的来源是原著者的家族后裔。我并未作过精确的统计,不过就印象所及,这样的例子占绝大多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它们在帝国发动大规模的清洗书籍运动时,或出于有意,或出于无心,保留不为帝国正统所容的东西。家族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囊袋,留存了各式各样的东西,它们似乎说明帝国穿透力的局限,到了家族的层次,帝国常须透过协议的方式进行控制。

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一文中,我已提到过,乾隆四十一年,皇帝决定褒谥明末忠烈之士,使得许许多多被禁抑的文献可以借着朝廷奖励忠义节操的名义,重新刊印。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通常在重刊这些文献时,会先做一番加工,将明显有违碍的地方删除或改动。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某些禁毁文献的评论,通常也被用来作为重刊某书的保护。不过我有一种感觉,即使有上述几道护符,人们在重刊时仍然战战兢兢,从他们为这些书所写的序文可以闻出一种戒慎恐惧的味道,而且还有不少被皇帝公开褒谥